


《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摘录

 朱俊帆 评论 维特根斯坦传  
2023-10-31 12:54:38 已编辑 美国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瑞·蒙克

81个摘录

第一章 自我毁灭的试验场

他成就了的事情,通常都带着“不顾他的本性”的意味。就此意味而言,终极的成就是对他自己的彻底克服——一种让哲学本身不再必要的转变。

世纪末维也纳[插图]现今的魅力,在于它的张力预示了主宰20世纪欧洲历史的张力。从其张力里涌现出了许多塑造了这段历史的智性和文化运动。用卡尔·克劳斯常被引用的话说,世纪末维也纳是“研究世界毁灭的试验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同出生地,是弗洛伊德建立心理分析的地方,是克里姆特、谢勒和柯柯什卡开创艺术领域中“青春风格”运动[插图]的地方,是勋伯格建立无调性音乐的地方,是阿道夫·鲁斯引入十足功能性、无装饰的建筑风格(现代建筑物的标志)的地方。在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新正于旧之中浮现,20世纪正于19世纪中浮现。

“青年维也纳”[插图]的知识分子与其先辈的区别在于,他们认出周遭的腐朽,不肯假装世道还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相信旧的作曲系统走到头了,是勋伯格的无调性系统的基础;确认巴洛克式的建筑装饰成了无意义的空壳,是阿道夫·鲁斯拒绝装饰的基础;感觉到某些很真实和重要的东西在社会的规矩和习俗下受到了压制和否定,是弗洛伊德假定存在无意识力量的基础。

天才的意识是最远离涵拟阶段的;“它具备最强最清澈的明确和清晰”。天才具有最发达的记忆力,具有形成明确判断的最强大能力,因此对于真假好坏的差异有着最精细的感觉。逻辑和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天才“是最高的道德,因此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男人并非生而有灵魂,而是有此潜能。要实现这潜能,就得找到真实的、更高的自我,挣脱(不真实的)经验自我的限制。

唯一值得过的生活是实现他负有的更大责任的生活: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天才的责任。

第三章 罗素的爱徒

毕竟,在成为罗素学生之前的数年里,哲学是他最强烈的冲动这件事在他身上造成的责任和冲动的冲突一直令他深受折磨。他确实相信,人应当——像他父亲、他哥哥汉斯和一切天才那样——是冲动的动物。但他也具有几乎压倒一切的责任感,而且易于产生反复的极度自我怀疑。罗素的鼓励之所以是必需的,恰是因为他能由此而克服这怀疑,快乐地听从自己最强烈的冲动。罗素鼓励他做哲学工作后,他身上立刻发生的变化令家人吃了一惊。他自己在这个学期末告诉罗素,他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是在罗素的屋子里度过的。但快乐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得以听从自己的冲动,还在于他确信——既然他有非同寻常的哲学天赋——自己有权这么做。

他突然说自己非常赞赏这段经文:“若一人赢得整个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于他又有何益[插图]”:

而要看出维特根斯坦对多余装饰的反感的力量——要看出这一点对他的伦理重要性——就得是个维也纳人;就得与卡尔·克劳斯和阿道夫·鲁斯感同身受:自海顿到舒伯特,曾经高贵的维也纳文化胜过了世上任何别的东西;而19世纪后半叶以来它却已经萎缩,用保尔·伊格尔曼的话说,成了一种“冒牌的低级的文化——一种变成自身反面的、被错误地用作装饰和面具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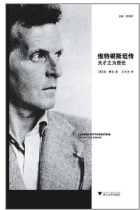
9月7日他们从利斯动身,上了斯特林号;这艘船的模样很像普通的海峡渡轮,对此维特根斯坦很是厌恶——他期待的是更豪华的船。他们在船上发现了一架钢琴;品生特带了套舒伯特歌曲的谱子,在其他乘客的起劲怂恿之下他



豆瓣豆品 | 美好双十一3.6折起  
豆瓣豆品

广告

> 维特根斯坦传



作者: [英] 瑞·蒙克  
出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定价: 79.00元  
装帧: 平装  
页数: 674  
时间: 2011-6

> 侵权投诉通道

坐下来弹奏,维特根斯坦这才平静了下来。他们得在相当狂躁的海面上航行五天,品生特和维特根斯坦都遭了罪;不过品生特好奇地发现,虽说维特根斯坦在自己舱里躺着的时间挺长,但从没真的生病。

在返程途中品生特说服维特根斯坦去伯明翰与他的家人共度一晚——他渴望让父母见识一下维特根斯坦。契机是市政厅的一场音乐会,节目单上有勃拉姆斯的《安魂曲》[插图]、施特劳斯的《莎乐美》、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和巴赫的一部经文歌《不要害怕》[插图]。维特根斯坦陶醉地听了勃拉姆斯,拒绝进场听施特劳斯,等贝多芬一结束就离开了市政厅。晚饭时,品生特请维特根斯坦把度假时教的逻辑对他父亲讲了一点,他父亲果然印象不错。“我觉得父亲感兴趣,”他写道,又说——用更肯定的语气——“无疑事后他赞同我的看法,维特根斯坦真的非常聪明和敏锐。”对品生特而言,这是“我有过的最美妙的假期”!

乡村的新鲜感——完全不用考虑节约的新鲜感——刺激感以及一切——这一切合起来使这次度假成了我有过的最奇妙经历。它几乎留给我——一个“神秘·浪漫”的印象:最大的浪漫在于新鲜感——新鲜的环境——等等,无论什么反正是新鲜的。

第四章 罗素的导师

品生特已安排好了,先和维特根斯坦见面,然后就跟他到西班牙度假。但见面时得知计划有变。(由于某种未说明的原因)西班牙已让位给了其他三个选项:安道尔、亚述尔群岛或挪威的卑尔根。品生特得选一个——“他非常在意地不肯显露对某种方案的偏好,要我无成见地作出选择”——但十分明显维特根斯坦选的是挪威,所以品生特就选了挪威。(实际上他喜欢亚述尔群岛,但维特根斯坦害怕在船上遇到成群的美国游客,“他受不了那个!”)所以,最后我们要去挪威而不是西班牙!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在最后一刻突然改了主意我无从去想!但我期待挪威也一样很好玩。

一到卑尔根,他们就去一个游客事务所询问,哪儿能找到维特根斯坦想要的那种地方:一家小旅馆,在某个海湾里,位于舒适的乡间,完全没游客。换句话说,一个维特根斯坦不受干扰地研究逻辑的完美地点。(现在应该很明显了,这才是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的原因。)在卑尔根的旅馆里他已开始工作。“工作时,”品生特记录,“他对自己咕哝着(混合着德语和英语),一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旅行社为他们找到了满足所有条件的地方——一个叫做埃斯德叙的小村子里的一家小旅馆,位于哈朗格峡湾;他俩将是那儿唯一的外国游客,另十位客人是挪威人。一到那儿他们就简短地走了走,品生特一向是个热心的摄影师,随身带着他的照相机,“这引起了跟维特根斯坦的又一场冲突”:

我会做出什么来吗??!如果我没有,那将是可怕的,我所有的工作将会失败。然而我并不是正在失去我的勇气,而是继续思考下去……我现在常常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感觉,仿佛我的工作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全部失败。但我仍然希望那不会是真的。维特根斯坦的情绪——一如既往地——随着工作能力而起伏。他对自己的进展感到沮丧时,就得是品生特去使他振作。

在他焦虑时,“自己可能很快会死”的感觉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自己注定会那样。这个假定成了他说的和做的一切的前提。他告诉品生特他不怕死——“但为了不浪费他生命剩下的片刻而极其忧虑”:这全系于他的完全病态和疯狂的信念:他快要死了——我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理由,为什么他不能再活很长时间。但想用道理驱散那信念或他对之的忧虑,是没用的:他抑制不住的信念和忧虑——因为他疯了。

看起来,这种濒临绝境的焦虑侵袭着维特根斯坦时,品生特很出色地振作了维特根斯坦的精神——品生特鼓励他,恢复他的信心,跟他玩多米诺骨牌,带他去划船,也许最重要的是,和他一起演奏音乐。度假期间他俩把舒伯特的约四十首歌曲编成一套曲目,维特根斯坦用口哨吹旋律,品生特弹伴奏。或许不奇怪——他俩对这次度假的感受差别甚剧。维特根斯坦说自己从未如此享受一个假期。品生特则没那么热烈:“我自个儿是挺有乐趣的……但路德维希现在这么神经质,和他单独在一起有时是种考验。”回去之后——10月2日——他发誓永远不再和维特根斯坦出行。

度假结束时维特根斯坦“突然宣布了一个最吓人的计划”:也即维特:他要流放自己,远离他认识的所有人生活若干年——比如说在挪威。他要彻底地独居,就他自己——隐居生活——什么也不做只做逻辑。他给出的理由我觉得很古怪——但无疑他觉得很真实:首先他认为,在那种环境下他做的工作将无限地多过和好过在剑桥,他说在剑桥老是容易受干扰和分心(例如音乐会),这是可怕的障碍。其次,他觉得自己无权生活在一个不同情他的世界里(跟他投合的人当然是很少的)——在那个世界里他永远感觉自己轻蔑别人,永远看见自己的神经脾气触怒他人——但那轻蔑(等等)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比如他是个真正伟大的人而且做出了真正伟大的工作。

第五章 挪威

可想而知,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到挪威独自生活两年的计划是疯狂和错乱的。他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想打消维特根斯坦的念头,但全都被置之不理:我说那儿黑,他说他恨日光。我说那儿孤独,他说跟聪明人说话是滥用他的心智。我说他疯了,他说上帝留他不必做精神健全的人。(上帝一定会的。)

1913年维特根斯坦需要的(或觉得自己需要的)是孤独。他找到了理想的地点:卑尔根北边、松恩峡湾旁的一个叫舒登的村子。他寄宿在当地邮政官汉斯·克林恩伯格家。“我在此地几乎碰不到人,”他写信给罗素,“我的挪威语进

步极慢。”这两个陈述都不全对。

他并未完全脱离跟人的接触。但他——也许这是最重要的——离开了社会,抛开了布尔乔亚生活强加给人的义务和期待——无论是剑桥的布尔乔亚生活还是维也纳的布尔乔亚生活。他对布尔乔亚生活的恐惧,部分源于这种生活强加给的人际关系的肤浅本性,但也部分源于这个事实:面对布尔乔亚生活时,他自己的天性把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冲突强加给他——必须抵抗那种生活和必须顺从那种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对于他需要的既是放松也是沉思的漫长孤独的散步而言,这乡村的美是完美的——在他内心生出了某种欢快。这一切合起来为他的思考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也许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毫不怀疑自己呆在正确的地方,做着正确的事;他在舒登度过的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一年。多年后他常回顾这段时间,将其视作一个他产生过一点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甚至“孕育了思考的新乐章”。“那时我的心智正火着!”他常说。

他被迫意识到,无论自己在逻辑领域里怎样接近彻底的、不妥协的清晰,在个人生活里——在他自身之中——他还差得很远。他在反抗和顺从间徘徊,在骚动和无动于衷间徘徊。“可是”,他告诉罗素:……我内心深处有一汪永恒的热流,就像温泉的底部;我一直希望来一次一劳永逸的喷发,于是我就能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 第六章 火线之后

此书经历其最终——也是最重要——转变的几年,是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没有联系的那几年。1915年10月22日的那封信后罗素再没听到过维特根斯坦的消息——直到意大利人俘虏维特根斯坦之后的1919年2月。罗素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写了《数理逻辑导论》(由于被控危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当时他正在监狱里服刑);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定义“重言式”;他添进了如下脚注:我过去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对定义数学的重要性,当时他正研究这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解决了这问题,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战争的最后两年,和品生特的通信也中止了。1915年9月2日品生特写信说,自己已“放弃了该死的法律学业”,正为政府工作。1916年,品生特设法寄来了三封信——都是用德语写的——其中第一封强调“战争不能改变我们的个人关系,战争与之毫不相干”。品生特在这些信里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现在接受了一点机械方面的训练,受聘当了工程师。维特根斯坦收到的品生特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日为1916年9月14日。

他们谈的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概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一本书维特根斯坦读得如此频繁,竟整段整段地记熟了;特别是佐西玛长老的言谈,对维特根斯坦而言,佐西玛长老是强有力的基督教徒的一个理想形象,一个能“直接看透别人灵魂”的圣人。

## 第七章 在前线

维特根斯坦和叔本华对这一学说的表述的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对之加了一个限制,即诉诸言辞时这一学说严格讲是无意义的,“唯我论者的意思是很正确的;只是它不能被说出,而是显露自身。”他认为自己走到了一个交汇点上——在这里叔本华的唯一论和弗雷格的实在论结合在同一观点里:这是我走过的路:观念论把人作为唯独之物从世界里挑出来,唯我论单把我挑出来;最后我看到,我也归属于世界的其他东西;于是一方面没有什么剩下来,另一方面,唯独的是世界。这样,若是严格地遵循观念论,观念论就走向了实在论。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弗雷格是把早先的自己从叔本华的观念论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家,而弗雷格看上去并未得知维特根斯坦又回到了观念论。

写自己的书时维特根斯坦从未丢开对品生特的挂念。7月26日他记下了又一封品生特的来信。信是用德语写的,品生特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兄弟死了,是在法国被杀的。“战争不能改变我们的个人关系,”品生特强调;“战争与之毫不相干。”“这友好和可爱的信,”维特根斯坦写道,“令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自己在这一流放中的活法。这或许是有益的流放,但我现在觉得是一次流放。”

这时奥地利军队已被逐回喀尔巴阡山脉,获胜的俄军在身后追击。条件是艰苦的——“冰冰冷,雨和雾,”维特根斯坦记道。这是“充满折磨的生活”:极难不失去自己。因为我是个软弱的人。但精神将有助于我。最好是我病了,那样至少我能有一点安宁。

鲁斯提到的学生是保尔·伊格尔曼;在奥匈帝国的一个原本文化相当贫瘠的边远地区,一群年轻人形成了一个自觉受教育的绿洲;伊格尔曼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员。那儿有弗里茨·茨威格,一个有才华的钢琴家,后来成了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有弗里茨的堂兄弟马克斯·茨威格,一个法律学生和剧作家;有海因里希(“海尼”)·格罗格,也是法律学生,后来是成功的大律师。伊格尔曼说格罗格是“我遇过的最机智的人之一”。伊格尔曼的兄弟也是个敏锐机智的人——后来成了维也纳有名的漫画家“彼得·恩”——尽管此时他和维特根斯坦彼此嫌恶。

## 第八章 印不出的真理

看到他身上的变化,他的家人感到灰心。他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受训当小学教师。伯特兰·罗素本人不是已经认可他的哲学天才了吗?不是说哲学里的下一大步将由他跨出吗?为什么现在要把那份天才浪费在无知的穷人身上?他姐姐赫尔米勒说,这就像用精密仪器开板条箱。对此维特根斯坦回答:你令我想起了一幅景象:有人从关着

的窗户看上去,不能解释一个过路人的奇怪运动。他不知道外面是哪种风暴在肆虐,也不知道那人只是吃力地想站稳。

人们当然会想,维特根斯坦比喻里的那人的最自然做法是进屋避开风暴。但维特根斯坦不能这样做。他在战争中所经受的艰难对他来说不是某种避之不及的东西,而恰是给予他的生命以意义的东西。若躲进家庭的富足和自己的教育提供的舒适和安全里避开风暴,将牺牲掉他与苦难作斗争时的一切收获。那将是为了生活在平原上而放弃攀登山峰。

第九章 “一个纯农村的岗位”

虽然格洛克尔纲领的追随者的改革热情并未触动维特根斯坦,但进入教师行业时他却带着一套更理想化的目标,而且,对于在乡村穷人中间生活和工作,他有一种相当浪漫的、托尔斯泰式的观念。遵循着自己的一般伦理世界观,他寻求的不是改善他们的外部条件,而是“内在地”改进他们。他想教他们数学,发展他们的智力;想让他们见识德语里的伟大经典,拓展他们的文化意识;想和他们一起读《圣经》,提升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摆脱贫困不是他的目标;他也不把教育视为一种令他们凭之过上城里“更好”生活的方法。他想让智性成就的价值自身打动他们——就像日后他反过来让体力工作的内在价值打动剑桥本科生一样。

无论在奥地利乡下还是在剑桥大学,他的教学里浮现出的理想是罗斯金式[插图]的诚实苦干理想,再加以精巧的智力、深刻的文化感受和虔诚的严肃;收入贫乏,但内在生活丰富。

在贫困的乡村地区工作对他有重要意义。然而,照师范学校毕业生的惯例,他被派往森梅岭附近马里亚-舒尔茨的一所学校履行一年的教学试用期;这是维也纳南部乡下的一个舒适和相对繁荣的小镇子,是有名的朝圣地。在简短察看了这地方后他认定不行。他对吃惊的校长说,他注意到镇子里有一个带喷泉的公园:“那不属于我,我要一个纯农村的岗位。”校长建议,那样的话他应当去特拉腾巴赫:镇子旁边的山的另一头的一个村子。维特根斯坦立刻动身步行了90分钟,很高兴地找到了正合他想像的那种地方。特拉腾巴赫小而贫穷。有工作的村民要么受雇于当地的纺织厂,要么受雇于毗邻的农场。这些村民的生活是艰难的,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贫困岁月里。但这地方(至少起初)迷住了维特根斯坦。到达后不久他写信给罗素;此时罗素在中国,刚刚开始在北京大学的一年访问讲学;维特根斯坦得意地把地址写成“特拉腾巴赫的LW老师”,陶醉于自己的新岗位之隐僻:

第十章 走出荒野

罗素的书只表达了对苏联政权的憎恨。他也用到了基督教的类比,但恰是用这个类比表达他的轻蔑:若和我一样相信自由的理智是人类进步的首要引擎,那么只能在根本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罗马教会一样多。激励着共产主义的希望,大体上和《山中布道》[插图]灌输的希望一样可敬;但那些希望被狂热地抱持着,具有造成同样多危害的同样可能。维特根斯坦自己对苏联的兴趣要追溯到罗素的书出版后不久——几乎就像是,他认为,如果罗素这么恨它,那么它那里就必定有好东西。1922年(那时他写信给保尔·伊格尔曼谈“我们讨论逃去俄国的可能性”)以来,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用凯恩斯的话讲——“在苏联那里寻觅好东西”的人;到苏联生活和工作的念头持续吸引着他,直到1937年,那时的政治局势令他不可能再如此。

布劳威尔的态度里的某些元素可能与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态度产生了共鸣,尤其是布劳威尔不同意罗素和拉姆塞提出的观点。这比罗素指出的那个具体之点——维特根斯坦像是接受了布劳威尔对“无限延伸序列”这个观念的拒斥——更为深刻,并且,构成了一种与罗素和拉姆塞的“布尔乔亚”心智有着根本分歧的哲学态度。在一个一般性的层面上,可以说布劳威尔的哲学立场属于大陆反理性主义思想传统;(例如)叔本华在此传统之列,维特根斯坦则对这传统——卡尔纳普曾吃惊地发现——抱有极大的同情。(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曾针对石里克的批评对叔本华辩护,卡尔纳普吃了一惊。)如同罗素和拉姆塞,维也纳小组立足于一个跟这一反理性主义传统毫不相干的立场。更具体地,在布劳威尔对罗素的逻辑主义的异议里,有某些元素可能激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同情之声。布劳威尔拒绝这一想法:数学能够或需要奠基在逻辑之上。他进一步拒绝这一观念:一致性证明对数学是至关重要的。他也拒绝通常理解的数学“客观性”——例如,布劳威尔认为,没有独立于心的、等数学家去发现的数学现实。在布劳威尔看来,数学家不是发现者而是创造者:数学不是一组事实,而是一种人心的构造。维特根斯坦赞同这一切

可以把他的后期工作视作这些思想的一种进展:进展到一个带他远离《逻辑哲学论》之逻辑原子主义的领域。

第十一章 第二次到来

一位深刻影响了维特根斯坦思想进展的“非布尔乔亚”思想家是皮耶罗·斯拉法,这种影响始于他回到剑桥的头一年。斯拉法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持有一种宽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是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尼·葛兰西的密友。因为公开抨击墨索里尼的政策,斯拉法在祖国的职位岌岌可危;凯恩斯便请他到国王学院工作,剑桥为他特别设了一个经济学讲师职位。经凯恩斯介绍认识后,他和维特根斯坦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维特根斯坦每周至少安排一次与他见面讨论。对于跟斯拉法的见面,他的评价甚至超过跟拉姆塞的见面。在《哲学研究》的前言里他谈到斯拉法的批评:“这本书里多数有意义的想法都受惠于他的这种激发。”这是个很强的声明,而且——考虑到他俩的智性领域差别很大——也令人费解。但正是因为不涉及细节(或者说因为斯拉法不是哲学家或数学家),斯拉法的批评才是富于意义的。与拉姆塞不同,斯拉法有能力迫使维特根斯坦作出修正——不

是修正这一点或那一点,而是修正整个视角。有一件轶事说明了这一点,这件事维特根斯坦对马尔科姆和冯·赖特都说过,此后广为流传。那是一次谈话;维特根斯坦坚持命题及其描述的东西必须有同样的“逻辑形式”(或“语法”,视故事的版本而定)。面对这一想法,斯拉法做了个那不勒斯人的手势——用指尖扫过下巴,问:“这个的逻辑形式是什么?”照这故事的说法,维特根斯坦因此不再坚持《逻辑哲学论》的这一思想:命题必须是其描述的现实的“图像”。这轶事的重要性,不在于解释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放弃意义的图像论(它并没解释),而在于它是一个好例子,说明了斯拉法是怎样使维特根斯坦从新鲜的视角重新看待事物的。维特根斯坦告诉许多朋友,与斯拉法的讨论令他觉得自己像一棵砍掉了所有树枝的树。这个隐喻是精心挑选的:把死的树枝砍掉,新的、更健壮的树枝就能长出来(而拉姆塞的反对则让死木头留在那儿,迫使树扭曲自身绕过它)。

他40岁了,人们却常常误会他是本科生。但还不止于此:他具有年轻人的智性上的新鲜和柔软。他告诉德鲁利,“心智的僵硬比身体早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他仍是个青年。即,在他的精神态度中,已然固执的部分很少。回剑桥时他准备全面修订自己迄今得到的一切结论——他愿意考虑的不只是新的思考方式,甚至还有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和本科生一样未定型,还没有固定在某种具体的生活模式里。

帕蒂森离开剑桥后,只要维特根斯坦路经伦敦(来回维也纳的路上常常经过),他俩就见面,举行维特根斯坦所称的“仪式”。这包括去“里昂”[插图]喝茶,随后前往莱切斯特广场的一家大电影院看电影。到伦敦前,维特根斯坦会寄一张卡片给帕蒂森,告诉他自己要来了,以便帕蒂森作出必要的安排——在《夜标》[插图]上找一家正上映一部“好”电影的电影院。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那意味着一部美国电影,西部电影尤佳,后来则是音乐剧或浪漫喜剧,但总归是一部绝无艺术性或知性面目的电影。不必说的是,这个仪式的位次高于帕蒂森的金融城工作。“我希望你在办公室别太多事,”一次帕蒂森拿工作压力说事后维特根斯坦写道,“记住,即便俾斯麦也可被替代。”

维特根斯坦和帕蒂森的通信里几乎全都是“废话”。几乎每封信里他都要用一用英语形容词“bloody”[插图];出于某种原因,他在这个词里看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他的信以“亲爱的老Blood”[插图]起首,以“你bloodily的”或“你in bloodiness的”[插图]结尾。帕蒂森寄去从杂志上剪下的照片,称之为自己的“画作”;对此,维特根斯坦用夸张的严肃口吻表示欣赏:“不看签名我就能知道这是帕蒂森之作。里头有一种此前从未用画笔表达过的bloodiness。”在回信里维特根斯坦寄去“肖像”,即从报纸的自强课程广告上裁下的相貌堂堂的中年男人照片。“我最近的照片,”放进一张这种图片后他宣布,“上一张只表达出慈父的亲切感;这一张表达出了胜利感。”

## 第十二章 “证实主义阶段”

维特根斯坦正在发展出一种根本不含任何论题的对哲学的观念。这其实已隐含在《逻辑哲学论》对哲学的评论里,尤其是在命题6.53中:哲学的正确方法真正说来是这样的:什么也不说,除了能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命题——即某种与哲学毫无关系的东西——然后,只要其他人想说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向他指出,他未能给予他的命题里的某些符号以意义。虽然其他人也许不满意——他不会觉得我们在教给他哲学——但这一方法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然而,《逻辑哲学论》自身——它的编号命题——出了名地未能遵守这一方法。坚称这些命题根本不是真正的命题,而是“冒牌命题”[插图]或“阐述”,是对这一核心困难之点的明显无法令人满意的遁词。而且,显然魏斯曼编辑的论题面临着类似的困难。哲学上的清晰必须由异于陈述学说的其他方式阐明。1930年,正当魏斯曼准备自己对维特根斯坦“论题”的引介时,维特根斯坦写道:“如果有人试图在哲学中提出论题,那么永远不可能对之进行争辩,因为每个人都将赞同它们。”维特根斯坦开始认为,哲学家不应教授学说和发展理论,而应指出一种达到清晰的技术,一种达到清晰的方法。对这一认识及其含意的阐明,把他带到了——照他对德鲁利的说法——“一个真正安稳的所在”。“我知道我的方法是对的,”他告诉德鲁利,“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我也是个生意人:我想要我的哲学像做生意,把一些事搞定,把一些事安顿好。”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过渡阶段”随之而结束。

## 第十三章 迷雾散去

在哲学中我们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建造一栋房子。甚至也不是奠定一栋房子的地基。我们仅仅“收拾屋子”。如此放低“科学的皇后”[插图]的身段,这事既是胜利的也是绝望的;它标志着天真的丧失,这种丧失是一种更一般的文化衰退的症候:……一旦找到了一种方法,那么表现人格的机会就相应地受到限制。我们时代的倾向是限制这种机会;这是文化衰落的时代或没有文化的时代的特征。在这样的时期,一个伟大的人不必稍减其伟大,但哲学现在缩减成一种熟练工,哲学家的光环正在消失。就像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时期说的和写的许多别的话一样,这段话体现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1918年;英语版1926年)的影响。斯宾格勒认为文明是萎缩了的文化。一种文化衰退时,曾经活生生的有机体僵化成一种死的、机械的结构。于是,物理学、数学和力学主导的时期压倒了艺术繁荣的时期。这个一般性的观点——尤其是把它应用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衰退上时——与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文化悲观主义十分合拍。

在科学家接管的时代里,伟大的人格——魏宁格的“天才”——无法在生活的主流里获得位置;他被迫陷入孤独。他只能游荡,收拾自己的屋子,远离周围进行着的一切房屋建造。

维特根斯坦努力在课上说明自己不给出任何哲学理论;他只是给出豁免于对这类理论之需要的方法。和他早先的观点不同,不能通过——现象学的或另外的——分析来描绘和揭示我们思想的句法和语法。“哲学分析,”他说,“不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思想的新东西(就算它这么做了,我们也不感兴趣)。”语法规则不能被哲学证成(justify),甚至

不能被哲学描述。哲学不能由(例如)一系列确定了我们语言的“深层语法”(用乔姆斯基的术语说的)的“基本”规则组成：

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我们永远不达到基本命题;我们到达使我们停止再提问的语言的边界。我们不达到事物的底部,而是触到一个我们不能再前进的地方,一个我们不能再提问的地方。

为了把两样东西联系起来,并不总是需要第三样东西:“事物必须用不着绳子而直接相连,即,它们必须已位于一种相互联系之中了,就像链条的链环。”语词与其意义之间的联系不是在理论中、而是在实践(practice)中、在语词的使用中找到的。不能用另一条规则阐明规则与其应用之间、语词与行为之间的直接联系;这联系必须被看出:“在这儿看出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只要你没看出新的系统,你就还没掌握它。”维特根斯坦对理论的摈弃,并非像罗素认为的那样拒绝了严肃的思考和理解的努力,而是采纳了一种对“要理解的是什么”的不同观念——与他之前的斯宾格勒和歌德的观念一样,这种观念强调“端赖于看出联系的理解”[插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十五章 弗朗西斯

在名为“哲学”的系列讲座里,维特根斯坦引入了一种技术,对于他的哲学方法,这一技术将越来越处于核心地位:构想出他所谓的“语言游戏”的技术。这是一种构想出想像中的场景的方法,在那种场景里,语言用于某些定义严谨的实践目的。那种语言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里的或某种完全虚构的语言里的几个词或短语;根本之点是,在描绘那场景时,若不提到这语言的使用,就不能描述这语言。这技术是一种治疗,目的是使我们免于一种哲学困惑,那种困惑源于:丢开语言在“生活之流”中的位置,孤立地考虑语言。

斯金纳已很难忍受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时的漫长暑假。夏末他写道:“我觉得离你又远了许多,我渴望再次亲近你。”他寄给维特根斯坦一套描绘了他家乡赫德福德郡莱奇沃思镇的图画明信片。他在卡片正面潦草地写几句话,表面上是介绍这个镇子,实际上更多是流露了斯金纳的心境;那些话说明,若维特根斯坦在千里之外,莱奇沃思就是地球上他最不想呆的一个地方。在一张印着霍华德角的卡片上,他解释说,“花园城市”莱奇沃思是想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生活在乡间的埃比尼泽·霍华德爵士建立的。“结果,”他写道,“是某种不可置信的压抑和血腥(起码对我而言)。”在一张印着布洛德卫的卡片上则写了:“这是通往镇子和车站的路。路的一边有一排房子。那些房子总是令我很悲伤。”一张斯拜尔拉工厂的照片上:“这是莱奇沃思最大的工厂……我觉得那花园是很无趣的和死寂的。”最后两张卡片印的是莱斯大街——“一条非常阴暗和压抑的街道。人们穿得都不合适,脸上都带着如此低贱的表情”——和伊斯奇普[插图]——“一个荒谬的名字……在那些街道上时,我觉得闲言碎语包围着自己。”

维特根斯坦建议自己的朋友和学生离开学术界,因为他相信学术界的大气太稀薄,不能支持正当的生活。他告诉德鲁利,剑桥没有氧气。他自己无所谓——他制造自己的氧气。但对于依赖周围空气的人,离开那儿进入一个更健康的环境,就是重要的了。他心目中的理想职业是医疗行业。

不止一次,维特根斯坦认真地考虑自己去当医生,逃离学术哲学的“死寂”。

第十六章 语言游戏：《蓝皮书和棕皮书》

维特根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汤姆森加上:“他在理论上反对它,但在实践上支持它。”这话跟维特根斯坦曾对罗兰德·赫特(赫特是斯金纳的密友,1934年认识维特根斯坦)讲的一句话是合拍的:“在心上[插图],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记住,维特根斯坦这一时期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他凭之获知苏联消息的朋友,是马克思主义者。除乔治·汤姆森之外,还有皮耶罗·斯拉法——在政治问题上维特根斯坦重视他的意见胜过任何其他人——尼古拉斯·巴赫金和莫里斯·多博。无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政治剧变中,维特根斯坦的同情是在工人阶级和失业者这边的,他拥护的——宽泛地说——是左派。

第十七章 “投身行伍”

维特根斯坦终其一生抱有当医生的愿望,他考虑了这种可能:带着去俄国行医的意图在英格兰学医;他甚至让凯恩斯承诺资助自己的医学训练。但他真正想要的,是获准在俄国作为体力劳动者定居。

在多数人只看到斯大林统治的暴政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强调了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以及在应付这些问题时取得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鲁利断言,英格兰和法国合力也不能击败希特勒的德国;它们需要俄国的支持。他告诉德鲁利:“人们控诉斯大林背叛了俄国革命。但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斯大林不得不应付的问题;也不知道斯大林看到的威胁着俄国的危险。”他立即又说,仿佛这两者有所关联:“我看着一张英国内阁的照片,对自己说,‘好多富有的老人’。”这一评论令人想起凯恩斯对俄国的刻画:“欧洲家族的美丽和愚蠢的最小儿子俄国,头上有头发,比起西方的秃顶哥哥,离大地和天空都更近。”我认为,维特根斯坦想去俄国生活的理由——既是“糟糕的甚至孩子气的”理由、也是“深刻的甚至好的”理由——跟他的这个愿望有很大关系:他想跟西方的老人、跟西欧的瓦解和衰退中的文化脱开干系。

第十八章 忏悔

他说,他试过记住维特根斯坦告诉他的:“怀抱希望、心生感激和深思熟虑(hopeful,grateful & thoughtful)”,但在这样的环境里那并不容易。

几天后他描述自己:“空虚、没想法、焦虑”——为独自生活而焦虑。“恐怕我会沮丧、无法工作”:我现在愿和某个人一起生活。在早晨看见一张人脸——另一方面,我现在变得如此软(soft),必须独自生活也许倒对我好。我现在格外可鄙。“我有一种感觉,”他写道,“我不会彻底没想法,但我会因为孤独而沮丧,会无法工作。我担心,在我的房子里我的思想会全被扼杀,在那里一种泄气的情绪会完全占据我。”

首先,你必须得到救赎:“然后,一切都将不同,若你能做现在不能做的事,也将‘不足为奇’。”比如:相信复活。看上去,相信复活是拯救的先决条件,但相信复活又需要拯救。谁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他自己还是上帝?脱离挪威的孤独地狱时,维特根斯坦似乎在说,他之脱离更大的地狱,他之脱离更大的孤独,是上帝的责任。他能忏悔他的罪,但宽恕这罪不是他的事。

第二十章 不情愿的教授

战争的头两年里维特根斯坦被迫留在剑桥当教师,尽管他很费了一番劲,想另找一个与抗战相关的工作,比如加入救护队。1937年9月,当工作做得不顺利,他敦促自己做点别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该如何找到做点不同的事的力量,”他问,“除了被强迫,像在一场战争里那样?”战争真的到来时,他发现战争远没有强迫自己做别的事,而是阻止他做别的事。他的德国名字和奥地利背景关闭了他做点“有用的”事的门。一方面,他继续授课,继续写他的书的后半部分;另一方面他渴望离开剑桥,以某种方式参与到这场斗争中去。“我觉得如果留在剑桥我会慢慢死掉,”他告诉约翰·赖尔,“我宁可找个快速死掉的机会。”

第二十一章 战时工作

战争的头两年,维特根斯坦谈话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话题是无法在学术圈子外找到工作的沮丧。他发觉在战争时期教哲学是不可忍受的,他最想做的是对抗战作出贡献。

维特根斯坦每天晚上去看一场电影,说明他在纽卡斯尔的工作多么艰苦,以及他多么严肃地对待这工作。这令人回想起他对德鲁利说的话:你觉得哲学够难了,但我可以告诉你,跟当一个好建筑师的困难相比这算不了什么。在维也纳为我姐姐造房子时,每天收工时我是如此精疲力竭,每天晚上唯一能做的是看一部“片子”。

第二十二章 斯旺西

如果赫特不能获得调令,那么他要做的唯一事情是:“做你真正做得好的工作;把它做得好到这种程度:你做它的时候不失去你的自尊。”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用自己具备的各种手段得到一个更好或更适合的工作,这是个动脑子的事。但如果那些手段失败了,那就到了这种时刻:总是抱怨和责怪不再有意义,应当去安定下来。你就像这么一个人:他搬进一个房间,说“哦,这只是暂时住住的”,就不拆开他的箱子。此刻没问题——暂时。但如果他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或下不了决心冒险彻底搬去(例如)另一个镇子,那么他就应该拆开箱子安定下来,无论那房间好不好。因为什么都胜过生活在等待状态中。“战争将会结束,”他坚持说,“最重要的是战争结束时你将是何种人。也就是说:战争结束时,你应当是一个人。而若你现在不锻炼自己,你将不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当责怪无益时停止责怪。在我看来,你应当要么申请调往靠近前线的某个地方、就冒次险,要么,如果你不想那样做,就在你身处的地方坐下来,不想挪动的事,只想做好你现在有的工作。

第二十三章 这个时代的黑暗

里斯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谈自己在斯旺西对着不感兴趣的学生教授逻辑时的挫败感,维特根斯坦的回应是同情和鼓励的:我很遗憾听说你工作的压抑环境。请不要屈服或绝望!我知道事情显出的压抑多么巨大;当然我是第一个想逃走的人,但我希望你振作起来。我记不清我曾给过你什么教逻辑的建议。无论如何,你的学生全都半睡半醒,你却想在教逻辑中获得哪怕一点儿成功,没有什么比这事更困难的了。(我听说过布雷斯韦特在我的课上打鼾。)请死死顶住!——我祝你有一个中等聪明的和醒着的学生给予你的劳作一点甜蜜!.....我重复一遍;请死死顶住!抱怨吧,诅咒吧,但继续前进。学生是笨的,但他们从中得到了点东西。

他惧怕回剑桥再行教授职责,恳求马尔科姆快点来英格兰,“在我下决心辞去荒谬的哲学教授工作前。这是一种活着的死。”

我数次尝试把我的成果熔铸为这样一个整体,然而都失败了;这时我看出我在这点上永不会成功。我看出我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始终不过是些哲学札记;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就变成了跛子——而这当然同这本书的性质本身有关系。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记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作的一系列风景速写。我当时一次次从不同的方向重新论及同样的要点,或几乎同样的要点,画出新的图画。这些图画里不知有多少画得很糟,或显不出特征,带有一个拙劣画家的所有缺陷。把这样的图画筛掉以后,还留下

一些勉强可用的;这些图画须得加以排列,时常还须修剪,以使它们能够为观者提供一幅风景画——所以这本书其实只是本画集。

在其学术生涯里,维特根斯坦一直保持着对职业哲学的敌意和对剑桥的不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重建”的岁月里,这敌意和不悦似乎开始与一种预言人性终结的末日眼光融合到一起了。

把这一末日预言式的焦虑联系到他对职业哲学的敌意上的,是他对我们时代里的科学力量的憎恶,这种力量一方面怂恿了哲学家“对一般性的渴求”,另一方面造出了原子弹。在一个奇特的意义上他甚至欢迎原子弹——倘若只有对之的恐惧才能减少一点社会对科学进步的敬重。

这并不荒谬——(例如)相信“科学技术的时代是人性终结的开始”;相信“伟大进步的观念是一种幻觉”,还有,相信“最终能认识真理的观念也是幻觉”;相信“科学知识里毫无善的和值得希求的东西,人类追寻科学知识时是在落进一个陷阱”。这一点绝不是明显的:事情不是那样子。无论是哪种情况,科学进步都会走到尽头。但对他来说,最悲观的看法是预见科学和技术的胜利:科学和工业,及其进步,将显出它们是现代世界里最持久的东西。也许,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科学和工业就要崩溃的任何推测都只是个梦想;也许科学和工业将一统世界,尽管它们在这一过程中造成无限的痛苦——我指把世界压减为一个单一的单元,尽管在这单元里和平是最无家可归的东西。

因此,“这个时代的黑暗”可直接归于对虚假的科学偶像的崇拜,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自己的工作瞄准的正是这一崇拜。于是,他之“梦想”科学和工业的崩溃,是在期待一个他那一类型的思考得到更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时代。这就联系到他对德鲁利说的话:“此刻的这个时代不需要我这一类型的思考,我必须如此强力地逆潮流而游。也许一百年后人们才真的需要我正写的东西。”可是,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干[插图],如果末日预言的观点不荒谬,那么,那种时候也许永远不会到来。永远不会有一个需要他那一类型思考的时代。维特根斯坦的政治预感使他更靠近左派,但因为他把对科学的崇拜视为最大的恶,他和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点距离。在翻看马克思·伊斯特曼的《马克思主义:它是科学吗?》时(他在里斯的书架上拿了这本书),对于伊斯特曼的这个观点——如果马克思主义想有助于革命,就得把它做得更科学一点——他评论道:

事实上没有比科学更保守的东西了。科学奠定铁轨。而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他们的工作要沿着那铁轨行进。他和共产主义者一样讨厌英国正统的自满,他想看到某种革命。但他希望那革命拒绝我们时代的科学世界观,而不是支持它。

无论这事是不是一个促进因素,1946年夏季学期期间,维特根斯坦越来越经常地考虑辞去自己的教席,离开剑桥。回斯旺西过暑假时,他对剑桥和学术哲学的厌恶到了顶峰。里斯不在,于是卡尔·布立吞就得面对这股厌恶的怒气:

那天,后来维特根斯坦在布立吞的家里喝茶。他的情绪较温和一点了,他谈到自己喜欢斯旺西(与讨厌伦敦和剑桥相对照)。他告诉布立吞他也喜欢英格兰北部,他回忆,有一次在纽卡斯尔他问公交车售票员到某家电影院在哪儿下车。售票员立刻说那家电影院正在放一部烂片,他应该去另一家。这引起了公交车上的一场火热争论:维特根斯坦应该看哪部片子,为什么。他告诉布立吞他喜欢这个;这是那种会在奥地利发生的事情。这最后的对比有所揭示,它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当时如此猛烈地攻击他所谓的“瓦解和腐烂着的英格兰文明”。简单地说:他在怀念维也纳。“合并”前夕以来他都没去过维也纳[插图],自那时起,他和奥地利的家人和朋友极少有接触。当教授是够糟的了,当英格兰的教授最终变得不可忍受。

## 第二十四章 一种面相的转变

维特根斯坦对人性命运的悲观态度,不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事件引起的——如我们所见,他的这种态度有一个长得多的历史;但那些事件似乎增加了他对自己长久持有的一个信念的把握:人类正奔向灾难。已然采用的杀人的机械方法,已然见证过的技术威力的恐怖展示——德累斯顿的轰炸、集中营的毒气室、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强有力地最终确立了:“科学和技术确实决定了战争”。他似乎因此更加确信自己的末日预言的观点:人类的终结是用机器取代精神、背身离开上帝并把我们的信赖放在科学“进步”上的结果。

战后岁月里他的笔记本上充满着这类反思。他写道,一幅闯入他脑海的画面,是我们的文明“宛如廉价地裹在玻璃纸里,隔离于一切伟大的事物,隔离于上帝”。他感到,房子、汽车和我们环境里的其他外部标志“把人与其来源分隔开,与崇高和永恒的东西分隔开,等等”。仿佛受了我们工业时代的外部标志的窒息,生活本身走到了头。当然,指望通过指出这一点而改变此进程,是徒劳的。这一进程是否真的必要?也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但人类极不可能回答说:“再次思虑过后:不必要。”然而维特根斯坦继续努力侵蚀他认为位于整场灾难的根子处的思维方式。他的弟子则能在他死后继续这一工作。他并非希望创立一个学派,或任何类似的东西。“我丝毫不确定,”他写道,“我是更愿意别人继续干我的工作,还是更愿意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一种令提出这一切问题变得不必要的改变。”

一种良构的学说无须掌握你;你可以犹如遵循医生的处方那般遵循它——但这儿你需要某种东西推动你,推着你转向一个新的方向——(这是我对之的理解。)一旦你转过了身,你就必须坚持这一转身。智慧是无激情的。相反,信仰是克尔凯郭尔所称的激情。



在爱的方面也一样,虽然感受到对爱的深深需要,但他经常觉得自己无能、恐惧。当然,他太敏感于爱之可能无常、爱之不确定,恐惧爱离他而去。1946年——发现自己毕竟还能爱一个人很可能是一种解脱——他爱上了剑桥的医学本科生本·理查兹。理查兹具备一种品质,我们现在已知道这种品质能温暖维特根斯坦的心:他极其温和,有一点胆怯,也许甚至温驯,但极其友善、体贴和敏感。

第二十五章 爱尔兰

远离剑桥代表的“瓦解和腐烂着的英格兰文明”,无疑是生活在爱尔兰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冯·赖特写信给他谈自己对申请剑桥哲学教授席位的犹豫,维特根斯坦回信说,他完全理解,而且他实际上以为冯·赖特不会申请,因为:“在我看来,成为英格兰人,或成为英格兰的难民,这种前景在我们的时代绝不是有吸引力的。”

1948年诺伯特·戴维斯实际上迫切需要鼓励。他是——还有达希尔·哈米特及其他《黑面具》的作者——美国“硬派(hard-boiled)”侦探小说的先锋之一。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放弃了律师职业去写侦探小说,享受了10年成功作家的日子。然而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陷入了困难。维特根斯坦写了给马尔科姆的那封信后不久,戴维斯写信对雷蒙德·钱德勒说,自己最近写的15个故事里的14个遭到退稿,请求钱德勒借他200美元。第二年他在贫困中死去,全然不知自己的一项罕见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荣耀:写了一本维特根斯坦喜欢得想写封感谢信给作者的书。

人们常常引用维特根斯坦谈哲学的话——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但人们常常看不到,在力求什么也不改变,只改变我们看事物的方式时,维特根斯坦试图改变一切。他对自己工作的成效持悲观主义,与此相联系,他深信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不是由我们的哲学信念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文化、我们得到抚养的方式决定的。面对着这个,正如他曾对卡尔·布立吞说过的:“一个人自个能做什么?”传统不是人能学习的东西;不是一根他觉得喜欢就能捡起的线;就像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先。缺乏但想拥有一种传统的人,就像一个不快乐地爱着的人。

第二十六章 无所归属之民

3月23日维特根斯坦离开维也纳回到伦敦,在伦敦呆了一个星期,住在洛什·里斯的妻子琼位于卡姆登陶思的家里。他写道,回到英格兰是“可悲的”。这地方的秩序是“可恶的”。人们像是死人;生活的一切火花都被扑灭。

两人一起绕着牛津散步,一时之间平克成了心腹友人。他们能相当坦率地讨论他们的思想、感觉和生活。例如,他们讨论隐藏自己真实本性的倾向。在这方面,平克问维特根斯坦是否认为他的哲学家工作,乃至他之为哲学家与他的同性恋有关。平克暗示的意思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工作也许是用于隐瞒他的同性恋的某种手段。维特根斯坦语带愤怒地踢走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

一个更根本的困难是,维特根斯坦总体上不喜欢英格兰文化:“我相信,若要欣赏一位作家,就得也喜欢那作家所属的文化。若觉得那文化平庸或讨厌,那么他的钦佩便冷却了。”这一点并未妨碍维特根斯坦钦佩布莱克或狄更斯。差别在于,在莎士比亚身上,维特根斯坦看不见一个他能将之当作伟大的人来钦佩的作家。

在狄更斯身上,维特根斯坦的确看见了一个能因为其“好的普遍艺术”——那种托尔斯泰意义上的、每个人都能懂而且拥护基督教美德的艺术——而投之以敬意的英格兰作家。弗拉克从苏门答腊回来时,维特根斯坦送了他一本《圣诞颂歌》当迟到的圣诞礼物;这是一本袖珍版,包着绿革皮,上面粘着喜洋洋的“圣诞快乐”胶贴。选这本书当然是有含义的。F.R.里维斯回忆,维特根斯坦几乎背熟了《圣诞颂歌》;实际上托尔斯泰在《艺术是什么?》这篇文章里把这本书归入了那个最高的艺术品类:“从上帝之爱中流出”的艺术。因此,作为礼物这本书极为适合这段友谊——这段友谊是矗立在维特根斯坦生活里的一个罕见例子,一个他对“普通人”的托尔斯泰式尊重的例子:对一位普通工人的简单直率的友爱。

他强调不能为框架自身辩护或证明框架是正确的;框架提供了进行辩护和证明的边界:我看见和听见的一切使我确信,没人曾远离过地球。在我的世界图景里没有任何东西支持相反的情况。但我不是因为我满意其正确性而获得了我的世界图景;也不是因为我满意其正确性而保持我的世界图景[插图]。不是的:它是继承而得的背景,我在这背景之中辨别真假。框架是变化的:曾被当作荒谬之事遭到拒斥的东西,现在也许被接受了;坚固的确定性被搬动和抛弃。然而,若没有某种框架,我们不能理解任何东西;在任一具体的框架内都得区分两种命题,一种命题借框架描述世界,一种命题描述框架本身,但这区分并不永远固定在同一个地方: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动。但我区分水在河床上的运动和河床自身的移动;虽然两者间并无截然的分界。

第二十七章 故事终

维特根斯坦寻觅的与上帝的和解,不是被接回天主教会的臂弯;那是一种伦理上的严肃和忠实的状态,那种状态甚至将经受住那位最严厉的法官的详尽审查,那位法官便是他自己的良心:“那住在我胸中的上帝”。

投诉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 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1人阅读 编辑 | 设置 | 删除

有用 0

没用 0

收藏

转发

回应 转发 收藏



添加回应

☐ 转发到广播

加上去